


· 大有党史文丛 ·

毛泽东著作要篇导读

MAOZEDONG ZHUZUO
YAOPIAN DAODU

谢春涛 / 主 编

 人 民 出 版 社

· 大有党史文丛 ·

毛泽东著作要篇导读

MAOZEDONG ZHUZUO
YAOPIAN DAODU

谢春涛 / 主 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封面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白 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著作要篇导读/谢春涛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7

ISBN 978-7-01-019026-6

I. ①毛… II. ①谢… III. ①毛泽东著作研究 IV. ①A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1501 号

毛泽东著作要篇导读

MAOZEDONG ZHUZUO YAOPIAN DAODU

谢春涛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70 千字

ISBN 978-7-01-019026-6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一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导读	1
二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导读	13
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导读	29
四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导读	41
五 《实践论》导读	52
六 《矛盾论》导读	64
七 《论持久战》导读	76
八 《〈共产党人〉发刊词》导读	91
九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导读	103
十 《新民主主义论》导读	118
十一 《改造我们的学习》导读	130
十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导读	139
十三 《论联合政府》导读	152
十四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导读	165
十五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导读	179
十六 《论人民民主专政》导读	192
十七 《论十大关系》导读	204
十八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导读	216
十九 《毛泽东外交文选》导读	231
二十 《毛泽东诗词集》导读	246

一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导 读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1927年3月,刊发于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和《湖南民报》。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刊发。后收入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是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学说,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历史背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革命大风暴。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有力地打击了几千年来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震动了社会各阶级,充分显示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但围绕这一迅猛

兴起的农民运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中国共产党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均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对农民运动极端恐惧和仇恨。他们不甘心自己的灭亡,联合起来向农民运动发起了疯狂的反扑:一方面,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造谣惑众,诅咒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诬蔑农民运动“影响北伐”、“妨碍税收”、“造成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叫嚷“农民运动不取缔,地方就永远不得安宁”,用最恶毒的咒骂来中伤农民运动,企图使农民陷于孤立;另一方面,组织反革命团体并利用反革命武装捣毁农会,残杀农会干部,甚至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企图以血腥的镇压破坏农民运动,使农民放弃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被农民运动的风暴吓破了胆,他们跟在地主豪绅后面反对农民运动,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胡闹”,要求加以“限制”,并以分裂统一战线相威胁,从多方面企图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以迫使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此时,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中心问题,形势的发展把农民问题最突出、最迫切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是坚决打退地主阶级的反扑,冲破资产阶级的阻挠,坚持领导农民运动继续前进,将革命引向胜利呢?还是被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抛弃农民这支广大的可靠的同盟军,使革命陷于孤立和失败呢?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农民问题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这种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主义者,被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们不但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运动,压制和反对农民革命,从而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1926年9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案》中规定了一系列限制农民运动的办法,例如:农民不可简单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农民协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规定农民武装绝对“不可有常备组织”、“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这在客观上适应了地主、资产阶级反对农民运动的

需要,从而助长了反动势力的反革命气焰,加速了中间派的动摇,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汉口召开。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指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这一主张,他提出:“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這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①当时,毛泽东虽然怀疑陈独秀的认识,但自己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辩驳。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在决议案中指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倾、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为此,会议规定的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显而易见,这些策略推行的结果,只会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掉工农群众的利益。几个月后,毛泽东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此时的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土地和武装。

正在此时,毛泽东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禱!”^②这正好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实地调查研究的机会,他决心去农村实地考察一下实际情况,农民运动是真的“过火”、“幼稚”吗?1926年12月17日,毛泽东从汉口到了长沙。当时,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②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湖南正举行工农代表大会。工农代表在大会上提出了许多问题,毛泽东逐一作答。毛泽东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40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显然,这些决议案同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的方针有明显的不同。

考察过程

为了支持迅速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回答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和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前后历时32天,行程七百公里,在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他原计划还考察宁乡、新化、宝庆、攸县等县,因时间紧张最后未能成行。

毛泽东是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下乡考察农民运动的。行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考察,并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做好考察工作。这六项具体内容为:一是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二是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三是解决开放米禁问题;四是指示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法;五是注意全国的革命问题;六是宣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决议案。这六条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此次农村调查工作的调查提纲。毛泽东考察期间,不仅有戴述人等陪同,各县党部也都有专人陪同。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启程考察农民运动。4日至9日,他先后在湘潭县城及银田、韶山一带考察。毛泽东在湘潭县城召开了座谈会,有县农协、工会、妇联、商协、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参加。1月9日至14日,毛泽东在湘乡县考察,召集县农协主要人员开调查会。1月15日至23日,毛泽东在衡山县考察,在白果区召开区农协干部座谈会。1月24日,他回到长沙,将在以上三县的调查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作了报告。1月27日至2月3日,毛

泽东又继续到醴陵县考察。2月4日,毛泽东回到长沙,邀请农协负责人座谈了解农运情况。在许多地方,毛泽东看到农会不仅从政治上打击地主,而且还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正是这些事情,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他为之兴奋不已。同时,农民运动受到的种种攻击,更使他忧虑不已。

2月5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省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执行委员会作了几次报告。受毛泽东报告的影响,中共湖南省执行委员会开始意识到前期工作存在的错误,即给中央写了《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对此前的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①紧接着,中共湖南省委和省农协开始在革命实践中纠正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2月16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他在报告中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并报告了自己纠正的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对于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注释1。

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他还在信的末尾说,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处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

随后几天,毛泽东开始撰写考察报告,不久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有两万多字。从3月5日—4月3日,该《报告》全文先后连续刊载于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周报第35、36期合刊及第38期、第39期上,又于3月12日在《向导》周刊上发表了部分章节,许多报刊如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相继转载,之后,遭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的反对,不准在《向导》周刊连载下去。中央局委员瞿秋白说:“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他们之所以不让连载,无非是“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他接着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他把毛泽东的报告全文交给秘书送汉口长江书店。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瞿秋白专门为该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充分肯定毛泽东这篇光辉的著作,指出:“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同时,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①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不久,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转载了《向导》周刊刊载的《报告》,并名之为《湖南农民运动(报

^①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206页。

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并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①正是《报告》的发表，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了解。

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热情地赞扬了农民运动的奇勋伟绩，反驳了党内外存在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科学地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策。具体而言，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毛泽东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明确提出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批判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和攻击，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强调了党领导农民革命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为什么农民运动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两座大山，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经济地位低下，因而具有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注释1。

烈的革命要求,所以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只有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农民运动的兴起,已经初步显示了自己的威力,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顺利进行,使得土豪劣绅闻风丧胆。

毛泽东在《报告》中严厉地驳斥了反动派攻击农民运动的谬论。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毛泽东认为,目前进行的这场农村大革命,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联合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他认为这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他认为,“糟得很”是反革命理论,是站在了地主利益的角度去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阻碍民主新秩序的建立。

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对待农民运动和农民问题的态度如何,是检验真革命、假革命或者反革命的试金石,是党内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的分水岭。“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农民运动,他号召一切革命者都应站在农民方面支持农民的斗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农民这个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革命领导权才有保证,中国民主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性。

第二,毛泽东通过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了农民问题就是贫农问题。

毛泽东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他们的经济地位不同,对于革命的态度也不同。富农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革命不能依靠他们。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在革命刚开始时,他们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等到革命形势高涨时,他们也能参加革命,对他们要多做解释工作,应该争取和团结他们。贫农是农村中最贫苦的阶层,他们经济地位低下、深受压

迫,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因而最具有革命精神。毛泽东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毛泽东高度地评价了贫农在农村革命中的作用,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他们参加,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毛泽东严厉斥责了那些诬蔑贫农是“痞子”、“惰农”的反革命言论。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革命者必须同一切攻击贫农的反动言行作斗争,坚决支持和拥护贫农的革命行动。因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实际上,毛泽东通过对农民各阶层的分析,已初步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政策,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农村工作的阶级路线的理论基础。

第三,毛泽东初步论述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

《报告》全文自始至终贯穿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革命思想。毛泽东认为,要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地主权力,必须充分发动和组织起亿万农民群众,在农村掀起一个大的革命高潮,并依靠革命的暴力,坚决打倒地主豪绅,相信农民群众自己会解放自己。毛泽东针对指责农村运动“过分”的观点,指出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农民运动中所谓“过分”的举动,完全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毛泽东在“所谓‘过分’的问题”一节中,批驳了那些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之类的右派议论,指出了要正确对待农民运动和农民群众,即便是出了一些“乱子”也要从正面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

人恶意地批评农会。”毛泽东在这里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即对于以贫农为主体的农民在农民运动中创造出来的经验,革命党要用善意帮助他们总结提高,决不能恶意中伤,更不能站在对立面去反对。对农民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新鲜经验,不要看不顺眼,总是指责群众这也不行,那也不是,用太多的清规戒律去束缚农民群众的手脚。毛泽东还针对种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谬论,列举了农民在农村运动大革命所做的十四件大事,他认为这十四件大事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应该是“好得很”,每个革命者都应予以支持。

第四,毛泽东论述了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必要性。

毛泽东在《报告》中阐明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即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他认为,农村革命,首先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而封建地主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统治的,必定起来反抗。所以,农民如果不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取代封建地主的政权,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因此,他主张必须坚决打碎旧的地主阶级的政权,代之以新的农民阶级的政权——农民协会。农会是唯一的权力机关,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只有建立农会的无上权威,才能迫使地主阶级向农民投降,接受农民的统治,才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彻底地扫除一切封建势力;乡村中一切经济的、文化教育的改革,反对宗法思想,反对族权、神权、夫权的斗争才有可能进行。

为了建立和保卫农民的革命政权,彻底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必须建立农民武装。毛泽东特别强调,农民武装,是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革命当局,应当普及,而不应该限制它,更不应该害怕它。毛泽东把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列为农民十四件大事之一,指出建立农民革命武装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夺取地主武装,将从反动地主手里夺过来的武装置于农民政权的管理之下,作为农民武装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建立农会的梭镖队,把广大农协会会员武装起来,这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毛泽东提出,每个青壮年农民都应有一柄梭镖,“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而不应该限制它。在这里,毛泽东初步提出了全民武装的思想。

重要意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发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以及中国共产党内右倾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诬蔑和攻击,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斗志。它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像一盏穿透迷雾的指路明灯,为革命的胜利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 历史意义。

(1)这篇报告以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和精辟的论证驳斥了一切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也就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为革命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方向。《报告》明确地提出了依靠贫农和团结中农、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战略思想,为从事农民运动的广大干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报告》一文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解决了当时影响革命全局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问题,有力地驳斥了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极大地支持了农民的革命斗争,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2)这篇报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建立农民武装政权的必要性。《报告》制定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理论,关于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的理论,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

要指导。

2. 现实意义。

(1)有利于深化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坚持群众路线。这篇报告中所提倡和坚持的相信和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斗争实践中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的斗争经验,并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前进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动发挥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提出和坚持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党的成长与壮大,革命的胜利与发展,都与群众路线息息相关。当党正确地制定和实行群众路线时,革命就胜利、发展;反之,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失败。

(2)有利于发扬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报告》是在党内外对当时革命形势出现争议时,毛泽东通过自己亲身调查实践得出来的科学结论。《报告》全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更要发扬调查研究、事实求是的优良传统,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高中华 撰稿)

二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导 读

这篇文献是毛泽东 1929 年 12 月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全文约六千字。原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亦称古田会议决议)共有八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的问题”最为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对这一部分进行了一些修改,并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题,收入了 1951 年 10 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收入 1991 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党和军队建设史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历史背景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的写作,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及特殊的革命中,党和军队建设遇到的新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经过短暂的筹备建立起来的。党建立后立即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大革命时期党缺乏经验,党的建设基本上是按